

社甫今論

易君左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民族詩壇叢刊

杜甫論

易君左 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目次

革命主義的人生觀

甲	以「國家至上主義」	定生命的基石………一
乙	以「國家至上主義」樹立創始的信仰………一四	
丙	以「國家至上主義」啓發文藝的機運………三三	

杜甫今論

馬君左

一 革命主義的人生觀

甲 以「國家至上主義」奠定生命的基石

自來研究杜甫的人，常陷於一種不可恕的錯誤，即對杜甫的「人格」並沒有認識清楚而進加以輕率的批評。由於這種輕率的批評，至少要使後人對於杜甫發生一個隔膜，因之在研究杜甫上不免有些成見。

這派人的說法可以分作兩類：

第一類，說杜甫是一個政治失敗者。就是說：杜甫的政治活動，完全是吃力不討好，以致潦倒官場。初到京師第一個經驗就是科第的失意。後來因上「三元大禮賦」蒙玄宗賞識，也不過命他待制集賢院。明年，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又明年，進「封西



獻賦」。再明年，才授他一個西河尉，却又不就，改右衛率府參軍。到肅宗時，昇左拾遺，又被罷免；次年出爲華州司功。直到代宗時，任京兆功曹。嚴武再鎮蜀，表起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這就是他最後一個官銜。照這樣看：杜甫是一個熱心做官的人，求仕之心甚切，但官運太不亨通；雖竭力向皇帝獻賦，想皇帝憐而拔用，結果並未蒙青睞，只給他一些不相干不重要的官職。

第二類，說杜甫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就是說：杜甫的一生並無一定的政見，心情和生計都是飄蕩的；只求達到「顯達」的目的，不擇手段。如悍將的哥舒翰、花驚定等，他都恭維。想做官時就恭維朝廷，做不到官就大事埋怨。對好朋友如嚴武等，也不能全始終。照這樣看，他簡直是一個投機主義者，並沒有一定的主義和一貫的思想。所以他的性格是偏躁的，行動是放浪的，這也就是他在政治上失敗的原因。

這兩類說法都是錯誤的。

爲首先要知道杜甫是一個真實的革命者。現在且把杜甫的一生來透視一下。杜甫的革命性：（一）先天的是基於祖先的遺傳，（二）後天的是基於家境的窮困。他的祖父杜審言，是初唐大詩人之一。舊唐書有一個杜審言的故事，說：

審言恃才褻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

曰：「吾之文章，合得補案作衡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於是普通人都說杜甫的祖父是一個犯誇大狂而善於談諧的文人，那裏知道這就是一種革命性。大凡天才高超的人，其理想必豐富，對現實多不滿，自信力必堅強。這不是「蹇傲」，不是「矜誕」。杜甫是得了他的祖父的遺傳，所以具有先天的革命性。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顧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可見他少年時自負不凡。而壯遊一詩，便是他少年生活的自敘傳：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所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背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馳騁小雄筆，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皆茫茫。……

從他的自述經過裏，可以看出他的革命性：生性豪放，嫉惡如仇，禮法疎略等；而其天才的高超，理想的豐富，對現實的不滿，自信力的堅強，都酷似他的祖父。這些，雖是早熟的文人的常態，確實有些遺傳的關係。

他的父親杜閑，一生無甚聲名，舊唐書只說以奉天（故城在今陝西乾縣）令終。新唐書說杜甫「負不自振」，看杜甫家境的窮困，可斷定他的父親至少是一個庶吏。杜甫生在

這樣一個清貧的家庭裏，並沒有享受過公子少爺的生活。在二十歲左右，就爲生活所驅，由故鄉靈縣（原籍是襄陽縣）開始浪遊，一直飄零了四五年。壯遊詩云：

……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志。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園廬丘墟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葉香。嵯峨閭門北，清閨映迴塘。每與吳太伯，撫事深波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燕然開七首，除患賴良章。婦女天下白，婚湖五月涼。剡溪遊秀異，欲語不能忘！……

那時他到了蘇杭一帶。他一方面歌頌山川的壯麗，一方面憑弔民族英雄的史蹟，雖在浪遊中而仍能顯映革命的憧憬。沒有能夠到日本，也許因爲沒有川資。在二十四五歲罷遊歸楚朝貢，下第考功之後，便又出遊齊趙。壯遊詩云：

……放浪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秦歌楚曲，冬獵青邱旁。呼鷹息歷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轡，引臂落殘鶩。僕侯談統鈔，忽如橫易陽。快意八九年，再歸到咸陽。……

這八九年的生活是他自己認爲「快意」的，然而其窮也就太可憐了！如初次在洛陽會見李白，贈詞云：

二年客東都，所歷圖史巧。野人對羣賢，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買藥資，山林跡如掃。……（贈李白）

貧窮一至如此！在他的少年時代，由於祖先的遺傳已伏下革命的根性，由於家境的窮困已磨成革命的心情。由壯年而晚年，越是顛沛流離，越是飢餓凍餒，他的革命精神越是

激揚奇發。

杜甫在壯年時代的一段苦大生活是他認為一段內心最苦的生活。他天天同飢寒交戰：

！窮蹙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感悲辛！……

（奉贈韋左丞二十韻）

病中得朋友「願酒飯，便覺得「手脚輕欲旋」（病中過王侍飲贈歌）；而「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進三絕）；「長安苦寒」則凍得「骨欲折」（投贈成節兩處諸子）；然而這種令人難堪的境遇，正所以建築他的革命的壁壘。他的一種奮鬥的勇氣，充分顯示他的革命精神。越是受現實壓迫，越是想衝破現實。他在窮餓裏拿騾來象徵自己的悲憤，即其一例：

當九秋之零落，為一鶚之直上，以建材爲己任，橫波而獨往。……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渡長江，索時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嶺嶺，養子青冥。縱兩年歲，忽然闕廷。莫試劉爪，空迴斗星。衆鶴猶歸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巖！

在那時，他有一個非常的舉動，即毅然不願意接受一個「爲五斗米而折腰」的河西尉：

不作河西尉，徒爲從事郎！……（官定後戲贈）

他對於當時政治的不滿，而又沒有方法使他來改造政治，於是迫使他放棄政治，甚而放棄與政治相聯。故在壯年以後，就開始踏上社會革命的大道。而他的一箇中年，便完全

籠罩在安史亂裏。在這一個時期，他全家流寓無定，遭遇非人所受，而他因革命精神抑鬱益奮發！當安祿山開始造反時，他從京師赴平，先看他的一家眷，結果是以此之慘：

……老妻寄異鄉，十日隔風雪。誰知久不還？應往共飢渴。入門聞別婦，幼子亂已卒……

而彭衡行一詩，寫全家避難的情景，簡直就是一幅難民圖：

憶昔遊離初，壯志凌雲飛。夜探窮鄉道，月照白水山。客室久徒，遠人多厚顏。一冬寒在時，不日遊子還。寒女刺暖，晴日虎溪間。懷中幾日，尺牘靜空閒。小兒驅羣羊，散牧空林餐。一知半解兩，濕漉漉，索然無餘兩臂，徑滑衣又寒。有時鄉鄰間，竟日里閒。充饑糧，草蔬皮屑，厚，石上水，暮宿天邊朔。少習周家鑑，欲出藍子。故人一紙，華會雲。已見嘉，張帶馬門。驅馬驅我足，勁紙如飛。從此遊學，如觀鴻圖，衆賢漫，與消致。

後卒陷入賊中，竄歸鳳翔，放往鄜州，省視家眷，有北征一詩云：

……經年至蒲月，妻子亦百結。慟松髯過。悲泉共咽咽。少年所嬌兒，此後與何等。見爺背而啼，垢膩脚，襁褓中一女，誰能才。除海國拆波濤，舊約移前折。大哭及三晝，題詞短褐。老，情恹恹，滿紙。……。無盡中帛，救汝無機。一爲小。他。衆村相羅列。瘦而復光，麗女顏自嬌，身亦不爲，殘敗手抹，及時前朱館。狼藉舊履屐。生，意，他志飢渴。四事竟掉髮，誰能說。嘆嗎？想思在賒，甘受難。新路上原爲，生，爲。

這樣非人生活的境遇，他不但不能灰心，反而鼓勵他的勇氣，刺激他的革命精神。死了兒子不算什麼，「一試失業徒，因遠戍卒，憂端終南，淚河不可掇！」這才是真悲哀！一家的慘慘不算悲苦，「伊洛掌收，西京不足救！」「禍轉亡朝，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只要國家有辦法，一家愁苦沒有關係。

雖覺一家愁苦沒有關係，但他已經知道：這些禍災的來源，只憑熱情的叫喊是無補於實事的，於是大膽地彈劾時政，指摘當時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病態。他諷刺為婦人權貴所把持窮奢極欲苛政日出的朝廷：

……凌晨「朝」，御馬正鳴，出塞塞空，鐵路塵香，路過氣鬱律，羽林「聲」，君臣留歡娛，樂動殿「鳴」。賜「皆」長纓，宴非「更」揭，形廷「分」帛，木自塞女出，鞭撻其夫系，聚散責或聞。聖人寵「謫」思，實微那「舌」，臣「忽」至，君竟棄物？多士盈朝廷，仁「宣」懷，視聞內金經，盡在衙「室」。中堂「傳」曲，謝客放玉，暖客翻風表，悲管逐清瑟。謝客說「難」美，霜殿還「看」酒。朱門酒肉臭，各「有」骨！「棄」拾咫尺，偶「再」再。……「京」赴「北」味懷五「字」

這是曲江長安到奉先路過驪山所見到的王室奢侈情形，對政府下一個「騰的彈劾！」

他痛斥為藩鎮所割據，低聲哀求的地方政府：

……「京」赴「北」味懷五「字」

如今年多，未傳國書，官家索租，租銀幾何？……（兵勇行）

對於在軍閥、地主、貴族，壓迫剝削下的勞苦農民妻極大的同情：

……客 新安道，喧嘩聞兵。信問新安吏：「帶小兒無了？」「府帖昨夜，次選中男丁」。
「中男細瘦小，何以等王？」「記男有惡逆，遺男獨伶仃，白水登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
眼枯，收汝淚橫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從一個過路客和人家問答中說出一個沒有成年的十八歲的中男都拉去當兵的事。

……我黑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無處歸。賤子因陳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
空村，日望氣慘慘！但對狐與狸，豈毛怒我時。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趨本枝，安辭
且樂棲。……（新安吏）

（新安吏）

寫一個敗兵回到自己離亂後的故園而不肯從事生產，反被官吏壓迫。杜甫實已成為當
代民衆的喉舌，社會制度的詛咒者，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惟一的平民的革命詩人！

晚年的杜甫的革命精神，並不因身心之愈加疲憊而趨於黯淡，反而更形其激昂，而革
命情緒之培植益見其醇厚，革命事業之計劃愈見其切實。一是他代表廣大的民衆的呼籲，
不是呼籲簡直是怒吼。如寫田父的心聲：「前日放聲哭，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
更家走！」（澆田父怨）「春田蜀川人打地不平：「農事都已休，兵戈况嚴屠。巴人困

軍餉，輸與土熱！」（高曲）「黃河西岸，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黃河）。寫生活的艱難：「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憶昔）。寫道路的阻：「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別唐詩）。寫徵征暴斂：「亂世誅急，黎民懷秘奉」（明經子摘耳）。「凄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同元唐詩）。「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窮盡哭！」（虎牙行）「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東屯北屯）。杜甫晚年詩中寫農村經濟破產的地方極多，而農村經濟破產純係由於軍閥的混戰與賦稅的繁重。即如寫他隔壁一個老頭兒：

——時為風飢，脫粟爲糲。相繼行且用，秋形部罪。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費用，迫此公家稅！……（甘林）

又如寫一個貧家女：

——石閭受重女，驅逐使官曹。丈夫死百役，暮還空寸縵。聞長吏略聞，剗剗及錐刀。貧人豈不仁，親戚相棄。索多門戶，復紛紛嘔嗽！……（道遇）

三絕句，是軍閥混戰的罪惡暴露：

前年徽州殺史，今年州刺史，謀盜。劇虎畏，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人獨，惟殘一。出路谷，自說二女醫。河頭即向秦雲哭！
軍市兵馬離離，縱暴略與荒涼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是杜甫勞動神聖，奮鬥求生存的詩。也有他年，踏實地交通，且常習勞作，在同谷七次，可看出個「白頭亂髮」的工人，在「一草一木」中，他與飢寒的天然環境奮鬥，熱情，泉一般地湧出！讀他七歌中的第三首：

有客。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耳。我拾橡栗，狙公曰天寒日暮山谷裏。中無膏粱不得，手脚凍皸皮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風從天來。

長鑱長鋤自六柄，我託子以爲命。黃鵠無由由雪盛，短衣數挽。維艱。此時與子空歸，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鄉里爲我色惆悵！

空手歸來，一家沈靜，只聞男呻女吟嗷嗷。讀此詩，很容易聯想到左拉（Zola）的失業。那個憔悴的失業工人，當他的女兒正幻想得出神，預把麵包慢慢地一塊一塊喫的時候，他却雙手空空回來！這不是杜甫的情境，嗚呼！

杜甫於時事的彈劾，而胆地提出政治題的見。奏行卽是這見的一個藍本。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百姓勞，高適西三城置戍論，請穩川節度，以一劍南，兩山急城稍減削，杜同以。寶侍御入京，所謂「此行入奏計非小！」就是寶侍御奏了，們政見奏什麼話呢？

……草草息人未盡，天子亦念西南隅？……

呼。八州刺史思一職，三城守邊那可圖！……

可惜這一國政，又未蒙採納，故一事不載問。

在夔州諸詩，杜甫晚年最精華作品。而諸將一首，反用排山色彩極其濃厚！如諸將的二、三、五首：

韓公本樂一戰，歷將天驕敵。座堂傾紇，勅期方兵。胡不覺潼關隘，龍

起而問首水清。獨以軍容震，君以名界平？

蕭關宿鐵北，休以秦關百二重。冷海不金關兩翼，傳門何處。雲對朝廷衰，城難多，天

下事不昌。稍昔還王相，肯綮甲車奮。令之鼓，杯之西，形之險，安危仗，材！

這些論行動上，表杜甫的革命的人生。越到晚年，越鏖鏖，一直到他的死。止，是一個徹頭徹底的革命主義者。而所以能成爲一貫的革命主義者的因，十分二三分，由於道傳十分七八是由於時代及環境，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包政治不良、國、亂、人心頹喪等）和一個極窮困的環境（包饑荒、疾病、亂、流亡、死亡等）。

現在，進一步透視杜甫革命的人生觀，堅實根據——「國家至上主義」。——集義證

實社會的一切政治活動都是爲國家的。第二要論實杜甫一切人事上的批評，都是爲國家的。換句話說：即是以國家的生命爲自己「生命」，只「國家沒有自己」。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所有人事上的批評悉以此爲準；其人其事是爲國家的則贊美，否則貶責。

試看：杜甫固然自己說過：「自謂頗挺出，立身要路津」。然而這並不是他一個人功名思想、英雄主義，而是他要完成他的改革社會的志願，所以接着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在他所獻的諸賦——也就是有人懷疑他以此爲獵官的工具——裏，並非自稱自道以博皇帝之一憐，求個人的出路，實在是都有關於國家的大典，所謂「願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如進三大禮賦表，分明說他進這一篇賦是：「竊慕堯舜尊卑之禮，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朝獻太清宮賦是一篇時代興亡史；朝享太廟賦，述大唐開國之艱難，有事於南郊賦，力勸人主「繼之以仁義，鍍之以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戎狄之影教」，即以安內攘外爲治國大本；進封西嶽賦表更說得明白：是「想有補於「明時」」，「至於仕進，非敢望也！」至於進鵬賦，也不是想如「買馬之徒」「排金門」「上玉堂」以「望仕進」，而是「鵬來喻明「正色立朝」之義與獨立自拔的人格。從這些文章裏，不能發現杜甫絲毫個人主義的色彩，也不能發現對皇帝的一味阿諛，完全是對國家的一片忠誠。他在朝做官歷計不過一年，在朝與在野全一樣，只知道維護國家的利益。蘇軾說：「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

「忠君愛國」並非壞名詞，不過杜甫之忠君，不是忠於一姓之個人，而是忠於整個國家。故非「天子」，而是「國家至上」。

關於人事，批評，贈舒翰詩，哥舒翰突騎施副都督，以勇略爲王忠嗣所重，有說哥舒翰收吐蕃殺人邀功，王忠嗣決不肯賞，杜甫反極意推崇他，不知何故？按王忠嗣就翰，哥舒翰入朝，王忠嗣以救的，哥舒翰說：「直道而行，王公必不冤死！」皇帝前力保得貶，王忠嗣見哥舒翰不負王忠嗣。石堡堡一役，王忠嗣於玄宗苦事開邊，杜甫高適詩，說：「諸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絕不爲哥舒翰辯護。卽潼關之敗，一般認爲哥舒翰的死罪，但也實在不相干。哥舒翰一意堅守潼關，戒勿輕戰，當崔乾祐在陝上，遣使促哥舒翰進兵，翰奏「祿山習兵，必當誘我，况賊勢日蹙，必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一戰擒也！」道與李光弼、郭子儀「北取范陽，填巢穴，潼關大軍，惟應固守」的意見正合。那知楊忠遺使再催，翰痛哭而出，已預知必敗；後來安慶緒殺安祿山，果應了

杜甫不是一個真正的儒教信徒。這又必須分為四點來說明：一是杜甫雖不是儒教的信徒，但確實受了儒教的不少影響；二是雖受了儒教不少的影響，但從祭就沒有受到儒教的束縛；三是不但沒有受到儒教的束縛，他還敢膽地衝破儒教已腐朽的藩籬；四是衝破了這腐朽的藩籬，却又能把儒教真正精神來發揚光大！

何以說杜甫受了儒教不少的影響？在他的作品裏，確實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發見儒教思想的色彩。他說「儒」的地方很多，如：「病休儒」，「有儒愁餓死」，「百年應腐儒」，「腐儒衰」，「謬通籍」，「乾坤一腐儒」，「儒」，「老」，「成」等。從他的血統說：他是有名左傳註釋家晉杜預的後人，「祭遠祖當君」，「祭八祖母」，及「唐改萬年君京兆杜氏墓誌諸文表」，送諸舅「八十一舅」，「十七舅」，「十舅」，「二十三舅」，及寄懷弟妹諸詩裏，調子詩裏，自傳式的詩裏，都可以看出濃厚的儒教色彩；即在門世詠諸作品裏，也常常可以指出。

但，只能說是在杜甫的作品裏有相當儒教色彩或受了儒教相當影響，而不能即說杜甫的人生觀足以代表全部儒教精神。儒教的精神是「差共的」，不是一齊等的，是「別愛」，不是一樣愛，故儒教並不排斥「自我」，而且主張先有「自我」才能及「他人」。這就是「老老幼幼」一貫的原理。儒教也並不完全注重現實，所謂實事主義，不過是儒教加以達到目的的一種方法，並不是目的。儒教注重現實同時，注重理想，忠恕同情，是儒教的精神，但非儒教「專利」的精神，世界偉大的宗教差不多都有這種精神。只

有「尊王攘夷」這一點確實是儒教的精神，但也並不是儒教的最高理想，儒教最高的理想是「大同」。

明乎此，則杜甫不是受了像一般人所說的不正確的儒教精神的影響，而是受了真正的儒教精神——影響。所謂真正儒教精神的影響，是指真正的聖賢相主義。杜甫的生命線上曾經占據過一點兩點，是指傳統的倫理觀念宗法意識。杜甫思想中曾經竄過三次五次，是指尊王攘夷主義在杜甫的作品裏至少有十篇八篇，要照這樣，才可說：杜甫的人生觀確實可以代表若干的儒教的真正精神。

何以說杜甫並沒有受到儒教的束縛？從道傳來說：杜甫雖秉承了遠祖杜甫的衣鉢，但到他的祖父杜審言那裏性格早已把原來的衣鉢破了而換了一個新衣鉢。傳道與杜甫，杜甫實就是一個受不慣儒教束縛的人，杜甫雖有時不能忘情遠祖的那舊衣鉢，却直接接受是祖父的這個新衣鉢。蘇軾：

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拜辭十六祖，身尊道更高，秦時相商鞅，法令如牛毛！」自稷契率，口中語也。又云：「知君志氣高，為促出山芝」。又云：「王侯將相寧有種，同我在邱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初。乃知子美詩外自有事在也。

東坡真是一雙慧眼！他看出杜甫雖受儒教的影响而尚有超過儒教影响的「第一義」而不杜甫所「所聞」。換句話說：杜甫並未受到儒教的束縛。他的思想始終是一個自由

的。然則所謂儒教的束縛是什麼東西？這並不是指細微末節而言（如飲酒及禮儀的禮教等）成一個舊式文人的生活姿態（不盡然，儒教的主張相合），乃是指儒教的根本精神；不在「突變」而在「漸進」，不在「革命」而在「改良」。杜甫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即以一般人認為他的奉守儒教的總口言的自是奉先縣縣懷那首詩說，也談不上什麼忠君一派的傳統說法，其內心乃在「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而這種爲廣大的衆求解放的心情却「取笑同學翁」；從儒教的信條應該只是「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而「胡爲慕大鯨，輒擬食溟渤」，便是他的革命精神的反撥，便是不甘受儒教思想的束縛的一個明證。在他的詩裏，要注意的就是那些「安得」「安得」的字樣，「安得壯士擣天外，使人不疑見不根！」（石壕），「安得壯士拔天綱，再平水土犀奔忙！」（石犀行），是真正的儒教不敢的。「安得廣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種精神與儒教是相反的：斷沒有自己宁可凍死而大庇天下寒士的道理。所以杜甫是一個絕對不受儒教束縛的偉人！

何以說杜甫能衝破儒教已腐朽的藩籬？這就是杜甫不滿意於當時的儒教。儒教在當日一方面因受其宗教的影響而日趨衰頹，一方面因本身的不振作而空留軀殼。那些亂臣賊子騷兵悍將與信寵嬖貪官污吏何曾不借儒教這塊招牌來欺君玩民惑世亂俗，所以杜甫最爲憤激。獨酌詩：「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歎儒術沒有辦法。而奉贈韋左丞丈二十

二韻，開口卽：「執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爲什麼多誤身？卽因「致有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種冠儒事業原來不過一種夢想，以致「此意漸蕭條」乃至「踏破鐵鞋無處覓」，誤身至此！這無異是宣告儒教破產。而醉歌一首其簡直赤裸裸地宣布儒教之絕對沒有關係，竟把我們的「大聖」與一個「大盜」相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有人說：這真是酒後狂言；但也可以：酒後見真情。在贈崔二學士詩裏，有一「儒術誠難起」的感慨。送蔡都尉詩裏，說：「健兒富門死，壯士恥爲儒！」「一貴長到死前，還歎息痛恨地說：「嗚呼已十年，儒服弊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益素志！」（題衡山縣文宣王廟）。

爲杜甫辯護的人說：在杜甫的當時，因爲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之大放異彩，儒教的內部，形成非常空虛，大部分的思想界的雄豪，一時都去儒歸佛或接近道教，只有杜甫不像現代的時流作家一樣而宣布自己轉變方向，還是保持他的頭骨僅存的破舊的儒冠。這種辯護自有一面之理，但杜甫絕對不是一個保持破舊儒冠的人，反而把這破舊的儒冠毀棄，而創造一頂新的思想上的王冠。這新的王冠才是杜甫的最高信仰。

何以說杜甫能儒教的真正精神發揚光大？真正儒家的思想可以分成四大類：（一）宇宙思想，（二）政治思想，（三）倫理思想，（四）教育思想。孔子對於宇宙只認識一個「天」，對「天」的思想順序：第一以爲天是昭昭不可欺的，第二以爲天是巍巍天，第三爲

信天，第四爲取法於天。杜甫則根本不信「天」。他相信「自我」，認識「現實」，要以「自我」來對付「現實」，不靠「天」來改變「現實」。所以對於儒家的宇宙思想不必與杜甫相並論。杜甫能發揚光大的，是儒家「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教育思想」，特別是前二者。孔子的政治思想，最主要，是德治主義、禮治主義、大義名分說、一統主義及王道主義。孔子在政治上標明「格主義」主張德治，反對法治。杜甫的「秦用刑鞅，法令如牛毛」，是與儒教政治思想符合，但儒教維持君主與臣民即統治者與被統治的關係，而杜甫則認爲這種縱的關係不是最高的政治理想，必須有一種橫的關係即人類間相互維繫的關係才足以達到儒家最高的理想的大同。大一統主義及王道主義是儒家所力主張，同時也是杜甫所極力主張，但杜甫在「大一統主義」之上還是倡一種「大一尊主義」，在「王道主義」上還提倡一種「人道主義」。換句話說：即從「尊王攘夷主義」伸展到「國家至上主義」，從政治上最高的理想擴大到社會上最高的理想。儒家有一個統御諸德的最高理想，就是「仁」。「仁」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杜甫的最高思想是「愛」，是無差別的「愛」，無等級的「愛」，從人類一直到萬物。如同情魚被捕（鰓打魚歌），鷄被縛，蟲之被啄（縛鷄行），鶴受傷（鷺江小園歌步），不外象徵物類之不得放與囚不得解放而受的痛苦。至於儒家的教育目的，在道德的人格之完成。教育方法，在排斥知識技能的注入。重理性的開發。杜甫的教育理想與方法，是能實踐儒家精神的，如對於他最

愛的一箇小兒子——宗武，教以「熟讀文選理」，「應須飽經術」，戒以「休覓綵衣輕」，「莫羨羅裳」，（宗武生日，又示宗武），可見杜甫以「升官發財」為教育子弟的切戒！總之，能發揚光大儒教的真正精神，杜甫總算是一個。但，與其說杜甫是一個真正儒教信徒，不如說他是儒家思想的批判者、修正者、及發揚光大者。

其次的解答，是：杜甫對各宗教都沒有信仰，有各宗教的最高精神而無各宗教的世俗的渣滓。這裏，要指出思想信仰之時代的背景。唐代是我國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統一以後，東洋西域的文化，因武功及交通的擴展，與中國固有的文化起了對流的作用，學術思想，盛極一時。天算、醫、經學、史學、文學的轉盛，尤為這時代最顯明的標幟。而直接影響當代社會生活，宗教思想的複雜與普及。

在唐代，外來的輸入，使國內思潮起了一種激變。回教、景教、摩尼教、祇教等，接踵而來，各種種關係而長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固有的道教、佛教，也受着外教的刺激，更從事於振作，以最大的速度普及。如佛教，在唐代樹立了不拔的基礎，以賢首大師、善導大師、善無畏三藏、玄奘三藏思想豐富的人物中心，形成了有名的宗派。如道教，則因李唐與老子同姓故，受帝室的特別尊敬與扶。玄宗好道教，異乎平常，甚至命家備道德經一卷，並詔天下貢舉人須向書館誦讀考試老子。至於歷史最久的儒教，反而不振，儒教在唐為何不振？一因唐的文化係接受了六朝浮華的風尚，有尊詩文而輕

學的傾向，而經學所以不能盛唐發達，又因為統一南北經學而編的五經正義反招致了學術的淆亂。幸而後來有李 韓的《周易集解》與啖助、春秋例疏等開了一點風氣；一因。唐代二百九十餘年間在思 東上 名而不過韓 和 人，而李翱則是韓 的 生，却與他的先生不一樣，以佛教的精神解釋儒 的經典，成了宋學的先驅。道教則藉皇帝的力量而趨隆盛。然而當時的道教，多半是一些方術之士，人民信道教是宗教，沒有認為是一種學理來研究的。其餘陰陽術數一學，如李淳風 班人牽連在道教內，也沒有什麼可傳，只有譚 一人為道儒二教的調和論者， 有譚子化書 最有力量的是佛教，所謂高僧輩出，著作如林，新宗派益起，完成了洋洋大觀的禪、華嚴、地論、俱舍、天台、淨土、三論、法相、攝論、真言、律、戒、成實、涅槃十三宗。這是唐代宗教思想發達的一般情況。

杜甫今論（二）

梁 啟 超

我們要指出的，就是杜甫的一生正躬逢其盛地捲入了這各種各派宗教思想激盪的最高漩渦。論儒教，與五經正義勅選爲同樣的精神之表現的御注孝經；論道教，遍設玄宗廟於全國，命家家具備御注道德經；論佛教，如真言宗卽密宗等之創立；都在玄宗時代。其餘外教也在玄宗時代滋蔓。杜甫的一生雖捲入在這激盪飛揚的漩渦裏，然而他的精神却超然在這激盪飛揚、漩渦之上。他的美麗的詩句中，雖不學仙而有時引用仙家的術語，如：「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他雖不學佛而有時運用佛理，「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但他不過偶然用這些名辭、術語、意理，來做他的修辭學的工具罷了。在他的交游中，也有所謂「方外交」。他的方外交，以和尚而論，與贊公爲最熟洽。然所謂最熟洽，也不過是住在這和尚的土屋裏，同他商量下鄉，想在西枝邨找一個置草堂的地址而結果並沒有成功，在別這和尚的時候還勸以「出處各一力」。其次是閻邱，因爲是世交所以很好。又如已公、文公、吳公、蔡司、大覺、真諦、太易等，都遍訪問，但對佛教並沒有一定的關係，所談都不過一些當前的「現實」，如家房子、與僧前塵（如話家常）之類，即如覺空寺僧的詩

中，也不過藉其爲物以寄家國的感歎，並無一語涉及信仰。這時道教盛行，杜甫雖與元逸人、董璩師、蕭尊師等來往，也不過是偶語烟霞，或題畫，或哀悼，以盡友誼。凡此，皆關於私人的行動，然一涉及國家大事，則杜甫的革命精神便立刻不顧一切地爆發出來！讀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一詩，對國家之尊崇道教表示大胆的抗議。這玄元皇帝就是李耳（老子），是高宗所封。玄宗在開元二十九年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天寶元年，陳王肅參軍田同秀上言，說玄元皇帝降於丹鳳門的通衢，一派的妖言偏信玄宗相信，乃置玄元廟於天寶坊，九月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在老子像後爲李林甫、陳希烈之形，後又去李林甫而製楊國忠像，太無聊了！杜甫這詩當是開元末所作，所以稱廟。在這首詩裏，大胆地指出玄元廟所祀之尊爲不經及宮殿的踰制。最有趣的是「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二句，謂史記不列李耳於世家，則元中勅升爲列傳之首，然不能升之於世家；玄宗雖親注道德經及舊崇玄學，然未必知道經之意：這是一片「微詞」。但對李耳本人並不菲薄，以爲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靜無爲，理國立身，是故身退則周衰，經傳則漢盛；即令不死，亦當藏名養拙，安敢見人降形，以博世主之崇奉，讓吳道子來亂畫一頓呢！此外如玉華宮、玉臺觀、九成宮諸篇，皆藉土木神鬼以糾正時政。杜甫對於各宗教的態度大致都如此。他覺得各宗教自有其特出的精神，但若一味地被人利用做工具，不但不是信仰宗教，而且還是阻礙宗教的真正進展。

若拿出另一種眼光來看，則發現杜甫雖沒有任何宗教的色彩，而確有道教真正淵源的老莊哲學的影響。這一點却要深切的注意！與其說杜甫受了儒家的不少的影響，不如說受了道家的不少的影響。而杜甫所受道家思想影響之特徵，即老莊的革命主義。道家的思想，也有在這裏簡單一述之必要。老子以宇宙的本體名「道」，針對儒家的「天」。老子所謂「道」，一爲宇宙的實在，一爲天地自然的法則。倫理思想，則莊子與老子一樣，以復歸於宇宙本體之「道」，爲倫理上的究竟目的。故凡關於與無爲自然的行爲相反的，道家一概排斥。最重要的是道家的政治理想。老子基於他的無爲自然的放任主義，要將禮樂刑政一切人爲的文化的設施或一切的拘束，完全撤廢，而歸於無爲自然，則天下治。對於現實破壞這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影響到了杜甫。「孔丘盜跖俱塵埃！」就是受了道家的影響，因孔子盜跖並舉是始自莊子的放語。劍門詩，藉關中的雄壯寫自己的抱負：「三皇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遠，職責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土。併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障！」可以說是一派老莊思想。寫懷二首裏說：「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煙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何如鐵密。加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又如「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江上》）「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曲江》），都有充分的道家色彩。杜甫所以與老莊哲學相同的基礎，即是由於政治社會的反響。春秋無義戰已久，此點與杜甫當

爭，這差不多是一種共有的最高理想，也不只墨家，不只杜甫。但杜甫決不是像普通一般人所說的非戰，而自有其界限。

其次，要解答的就是杜甫自有一個最高的信仰。這個最高信仰就是「國家至上主義」。對於各種宗教信仰各派哲學思想的批判與不滿意，正因各宗教各學派不但不能發揮其根本精神以利人世，而且：（一）做了某一部份人的工具，失掉了原來的面目，（二）本身不能推行，甚至違反了初衷，其結果，不但無益於人世，而且有害於社會。杜甫因此衝破了一切宗教一切學派的藩籬而建立其自我的創造的信仰，認定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一切活動應服屬於國家。萬人之心應一致捧獻國家。所以個人應犧牲一切以謀國家的利益。國家是個人唯一的出路，個人離開國家沒有出路——這是「國家至上主義」的原則。

杜甫認定在當時非擁護「國家至上主義」不可。實在地說：在杜甫的當時，「國家」這一個名辭都不容易說出，那裏還談得到「至上」？在一般老百姓，即廣大的農民羣，受着人禍天災的重重壓迫，求死不得求生不能，那裏知道什麼「國家」？農民眼中的「政府」只是一個「收錢糧、抓壯丁」的「官衙」，如果「政府」是代表「國家」的話，則當時農民縱有「國家」的認識，試問還有什麼好感？地方的軍閥，眼底那裏有什麼「國家」？他們的行為全是誤國、禍國、賣國。貪官污吏只有私利沒有公益，與「國家」更不相關。在執政大臣或名將中也許有幾個忠心為國的，但大部份的腦子裏都沒有「國家」的影子。

子。乃至皇帝都不以「國家」爲重，不能實行「國家」的忠實的方針。這樣一個人要則去找不着「國家」的天下，焉得不亡？焉得不亂？杜甫真從這慘淡的雲霧裏撥出青天白日來，要替人生尋到一條光明而有意義的道路。他不但發現「國家」的重要，而且認定「國家」是「至上」！一個人的利益，一部份的利益，一團體的利益，一黨一派的利益，一階級的利益，一個宗教或一個學派的利益，都應隸從在整個的國家利益之下。一個人，一個體，一黨一派，一階級，一宗教一學派，都應竭誠擁護整個的國家利益，因爲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如果個人等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是相成的，則個人等利益於國家利益之內，否則廢之出外。

杜甫把這種基本信仰充實他的生活內容，並強調其寫作力量。現從以下兩點分析：

第一，一般人說杜甫「忠君愛國」究竟是什麼意義？站在杜甫本位上，所謂「忠君愛國」，並不是忠於姓李的，忠於某一個人，忠於皇帝，而是忠於「愛國」的「君」。如果這一個「君」是「不愛國」的，老實說：就沒有「忠」的必要；如果這一個「君」是「愛國」的，簡直說：那就非「忠」不可。這一個意義，就是一切以國家爲前提，一切以社稷爲重。「君」自然也應以國家社稷爲重，離開了國家社稷還有什麼「君」？所以「忠君」必與「愛國」相聯，「忠君愛國」只是一個名辭。杜甫身歷三朝（玄宗、肅宗、代宗），所期望於當時代表國家意志的人是何等殷切！對於所謂「人主」，如果是能盡忠於國事，替國家

福利，則應該予以鼓勵和宣揚；如果以國事爲兒戲，陷國家於不利，則應該向其諷勸並遣彈劾。試舉杜甫一二例爲證：他對玄宗，如開元十七年葬睿宗於橋陵，玄宗望陵涕泣，所以他說：「孝理攷國政」，而仍得到「國家至上主義」，希望這橋陵「永與奧區固！」（橋陵詩）。至麗人行等則簡直痛指玄宗的荒淫。他對肅宗，如喜達行在所：「猶嗟太白雪，喜過武功天！」「今朝漢社稷，重數中興年！」收京三首：「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而洗兵馬則純粹諷刺肅宗不能盡子道，信任父之賢臣以共濟國難。他對代宗，因國家安危所繫，將適吳楚還篤念：「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別蔡十四也說：「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但在建都裏則以「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勉勵代宗「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

第二、引伸前一個意義，即不但君要愛國，所有一切的人都要愛國。比如所謂「臣」，「臣」不是對「君」的關係，而是「公務員」對「國家」的關係。「公務員」對「國家」不但應該「愛」，而且應該「忠」，而「忠」就是「愛」。更泛言之，凡是國民都應該愛國，都應該盡忠國家。以公務員說：如官吏、軍人，受國家的祿養，與國家關係最深，更應盡忠愛國。八哀詩裏，所贈的都是名公鉅卿，而所記的蹟都是各人爲國效勞的艱苦。尤其對於他的知己嚴武，寫得更入微：「豈無成都酒？愛國只細傾」。如送樊侍御詩：「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送郭中丞詩：「幾時迴節鉞？戮力

掃落……人傾險途炭，公豈無精誠？」送鄒司戶詩：「萬里傷心險惡身，百年垂死中興時！」這是對文官而言。至如武官：如魏將軍歌，勉其「萬歲千秋奉明主！」贈哥舒開府詩：「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茅土加名數，乾坤誓始終！」勉其一心衛國。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始是乾坤王室止，却收江漢客魂銷！」對李光弼的赤心爲國，贊道：「竟能盡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對郭子儀也獎勵備至：「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送蔡都尉說：「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奮門死，壯士恥爲儒」。尤其寄贈他的老友高使君（適），勉以衝破國難後再假武修文：「蚩尤終戮等，胡羯沒狼聲，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裏糧」。這是抱有「抗戰必勝」的信念。杜甫對於他自己的體策與對於親族的期勉，更不待說。在他的近乎自傳的諸詩裏，只有窮愁語，沒有消極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暮深投拾遺，流離主恩厚……漢運初中興，生平老壯心」。東胡反表已，臣甫憤所切。揮淚繼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而壯遊詩裏，只兩句已足代表他全部的心襟：「上感九廟靈，下憫萬民瘡！」他自己也是一個公務員（官員當補授，當領心爲報），但誰能像他這樣愛心爲國？如客軍詩：「主憂豈忘時，身遠無歸國，衛文廟算正，獻可美衛直。尙想趨朝廷，牽髮裨社稷」。他投奔舅父崔少府，請他收飯，雖感着「玉筋談無味」，然而「胡羯豈強敵？」送從弟做判官說：「宗廟尙爲灰，君臣俱下淚……須存武威」。

鄉，爲畫長久利！」寄崔評事十六弟說：「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漠苑歸騶騶」。陷賊中寄韋氏妹還說：「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乃至於來一個客，和一個野老農夫攀談，都不會忘記國家。如客居詩：「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稷契易爲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番」。園人送瓜，而感到前方將士的辛苦：「食新先戰士！」都足見他一心爲國的精神。所以說：杜甫一生有一個最高的信仰——「國家至上主義」。

杜甫今論（三）

易君左

丙 以「國家至上主義」啓導文藝的機運

杜甫在文藝上的造就，自來批評的最多；若歸納起來，可以分爲二派：第一派是贊成論，第二派是反對論（因爲唐代大詩人李白與杜甫並稱，所以講到杜甫，常有牽及李白之處）。第一派的批評，如元稹說：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靡，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比次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平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望與乎？（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跋）

白居易也屬於這一派：

……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迫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

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融糅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與元微之書）。韓愈說：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蚺蜺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調張籍詩）

蘇軾說：

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坡詩話）

秦觀也稱：

杜子美之詩，實積衆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淡；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無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淮海集）

又如葛立方竟說：

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韻語陽秋）

蘇軾分杜詩爲六支：

公之詩，支爲大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李商隱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賤博。（杜工部詩集序）

詩家則抓住杜甫的一點說：

少陵真本領，仍在少陵詩中「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語。蓋其筆力豪勁，足以翻其才思之所至，故深入無淺語。微之謂其「薄風、雅、賤沈、宋，奪蘇、李，吞曹、鄴，掩顏、謝，綜徐、庾」，則似專以學力集大成，此耳食之論也。（歐北詩話）方以智舉出杜甫的寫作方法：

老杜以平實敘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實無奇而得自在者也。（通雅）其對於杜詩分別評論比較詳細的，如沈德潛。如五言詩的評語：

長篇意本連屬，而學問博，力量大，轉接無痕，莫測端倪，轉似不連屬者，千古以來，讓渠獨步。（唐詩別裁）

如七言詩的評語：

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蟻蟻畢集；別於盛唐諸家，獨稱大宗。（同上）如五律七律的評語：

杜詩近體，氣局闊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及處，尤在錯綜任意，寓變法於嚴整

之中，斯足凌轢千古！（同上）

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學之博也，才之大也，氣之盛也，格之變也；五色藻續，八音和鳴，後人如何髣髴？（同上）

連乾隆帝也大批評其杜詩

有唐詩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大成，爲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迄今奉爲矩矱，無異議者。然有同時並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均力敵，而無所多讓，太白亦先古一人也。

又說：

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途同歸者，觀其全詩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恣縱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沈鬱，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窮極筆勢，盡乎事之曲折而止。

更說明殊途同歸的地方：

若其蒿目時政，疾心朝廷，凡亂之萌，善敗之實，靡不託之歌謠，反覆慨歎，以致其忠愛之志。其根於性情，篤君上者，按而稽之，固無不同矣。至於根本風、騷，馳驅漢、魏，擷六朝之精華，掃五代之靡曼，詞華炳蔚，照耀百世，兩人又何以異哉？（均見唐宋詩醇序）

觀上說，如元稹是說杜詩的淵源，白居易是說杜詩的格律，韓愈是說杜詩的氣勢，蘇軾是說杜詩的品格，秦觀是說杜詩的內涵，葛立方是說杜詩的特性，孫僅是說杜詩的影響，趙翼是說杜詩的態度，方以智是說杜詩的體制，沈德潛是說杜詩的力量，乾隆是說杜詩的宗旨。

第二派的批評，如宋之楊億，不喜杜詩，謂之爲「村夫子」(武夷新集)。歐陽修亦然。

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道稱李、杜。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超飛揚，爲感歎也。(中山詩話)

明之楊慎論李白的荊州歌，說：

有漢謠之風，唐人詩可入漢、魏樂府者，惟太白此首……而止。杜子美却無一篇可入此格。(楊升庵外集)

又說杜甫的絕句：

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泊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泊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同上)

又說一個比喻：

盛弘之荊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辭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

奔御風，不以病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刻目擊信有證」。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詩同用聲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同上）詩辨抵批評杜詩，有「老而失於俚」，「沉雄而失之粗硬」的話。至於王禪登，便說：

李龍兼杜，杜不能兼李；李蓋天授，杜由人力。（李翰卿分體全集序）

翻上說，如楊億是不滿意杜詩的大衆化，歐陽修是不滿意杜詩的老樸，楊慎是不滿意杜詩的謹飭，詩辨抵是不滿意杜詩的沉雄，王禪登是不滿意杜詩的非由於天才。

這兩派的批評，自然以第一派的議論爲合理。第二派只是看到杜詩的一面，或抓住杜詩的一點，從而吹毛求疵，或責非所宜。如杜詩爲人所不及處，即對仗之工穩。光是對仗工穩，有是處，而妙在出之自然而又飽含性情。如所謂「俚俗」、「粗硬」，這正是杜詩語體化、平民化的特色。寫巫峽江水一詩，李白是側重性靈，杜甫是注重樸質，各有各的立場，何得遽定優劣？至於杜甫本人，不但有雄厚的筆力，而且有優越的天才，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並不是他的誇語。

但推崇杜甫的也沒有搔到癢處：第一，沒有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杜甫。研究杜甫要從以下兩方面去努力：一方面是先天的關係，如遺傳性、個性、本人的氣質、才能等；一方

而是後天的關係，如教育、環境、遭際、時代等；而氣候、地帶的關係也不少。杜甫爲什麼在文學上有最高的成就？若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則很容易明瞭。從先天的關係說：他至少得到了祖父聰穎超拔的根性，而他個人的生性也特異優越，智慧開得很早，是一個七歲就能做詩的「神童」；從後天的關係說：他受過清寒家庭的撫育，一生都是逆境，又親自遇到大變亂、大流離、大饑饉的大時代；所以他的作品都是他的心聲，是真情的流露，是力的表現。他是原籍襄陽，後徙鞏縣，適位於中國中原地帶的人，故其詩異常雄渾；入蜀以後，瘴癘陰濕，久居巫峽，雲蒸雨湧，影響他的身體，同時也就影響他的作風。他的詩爲什麼越入晚年越好？變質諸篇，動天地而泣鬼神，爲一生寫作的精華的結穴，這都是因爲越到晚年越窮苦不堪，一直到飄流悲慘以死。所謂「詩窮而後工」，不是指沒有錢就會好，而是指境遇不好才會好。而自來恭維杜甫的，完全忽視了這一點，差不多都只從「詩」的本質及其關係上來引證鋪述，從沒有從「人」的本質及其環境上來引證鋪述。人，詩的主體，如果從主體來研究，而只在客體的詩來研究，結果將犯「數典忘祖」、「喧賓奪主」等毛病，何能得到真諦？如杜甫詩的淵源、體裁、態度等，要研究爲什麼會有這淵源、體裁和態度？杜甫的詩，不是錢謙益說、衛德信、名詞、形容詞可以包括的。故與其抽象概括的說，不如具體分析的說。只其持東拉西的論，不即就其本身評論，而且一個人的詩正與他本人一樣，不能說是全善全能，不能說是無美不備。有時他的缺憾，反可補助其完

全；有時他雖完全，總還要留些缺憾。若照推崇杜甫的人的說法，恨不得把杜甫抬上天，有推爲「孔子大成」的（如秦觀），有贊爲「周公制作」的（如鄧尚昭），有許爲「詩中之史」的（如黃魯直），有稱爲「詩中之經」的（如羅景嵩），有尊爲「詩中之聖」的（如楊誠齋），有奉爲「詩中之神」的（如王元美）；有的還相當，有的就太籠統。第二，沒有站在客觀的地位來研究杜甫。自來的批評家常犯了以下兩種毛病：一是趣味主義，即批評人家總是喜歡憑着自己的趣味，個人的趣味不能說是可靠的批評標準。因爲一個作家自有一個作家的風範，其特有的情調，而這種風範與情調，不是能迎合張三也能適應李四的，假使批評家自己的情調、風範與那作家不同，就批評人家如何不好，或者同的時候，就批評人家如何的好，都不是合理的標準。合理的標準是要根據那作家的一切，即上面所說的先天的與後天的各種條件，離開了這些條件或缺少這條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容易樹立一個真實的批評，都不是合理批評的標準；一是比較主義，即批評人家總是喜歡把一個作家和另一個或幾個或許多的作家比擬，不以那一個作家爲主體或本位，而東扯西拉地說這個長那個短，這也是忽視了每一個作家的個性及精神。甲作家不能與乙作家強同，同樣，乙作家也不能與甲作家強同，推而至於丙、丁、戊、己、……作家也一樣。固然對於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來辨別他們的差異是可以的，但不能品評到他們的優劣。譬如音樂，有高亢激昂之音，有沉鬱悲涼之調；譬如圖畫，有工筆的翎毛畫，有粗筆的山水畫，而其同有藝術

術上的價值則一。以上兩種毛病，病根就在完全站在批評者自己主觀的立場上，而沒有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以致演成不正確的批評和不精細的判斷。自來研究杜甫的也是犯了這種毛病。如趙翼說元稹的批評杜甫似專以學力集大成爲耳食之論，而舉「語不驚人死不休」爲杜甫之真本領，以我看來，元稹、翼同樣犯了趣味主義的毛病，即純以個人趣味爲中心，元稹且犯了比較主義的毛病。秦觀也犯了同樣的毛病。沈德潛雖然批評得精細，但也純以個人趣味爲中心，而把杜詩的「五言割裂來批評，是毛病之中又有毛病。孫僅的硬派法，實在不妥當，杜詩除所謂「氣焰」「簡麗」「清雅」「奇僻」「豪健」「瞻博」等外，還可以裝上許多形容詞，試問又派那些人來「得」？蘇軾本着他的忠君的主張，就說杜詩的好處即在一飯未嘗忘君，這也未免有些牽強，還是犯了上觀的毛病。韓愈和那位乾隆皇帝的批評還不錯。但乾隆因爲要保持他的皇帝的立場，要使「臣子」「庶民」盡忠於他自己，不惜把「忠愛之志」，「篤於君上」諸語特別指出來，認爲是李、杜二大詩人的「同歸」之處，不獨牽強附會，也同樣犯了上面的兩種毛病，尤其是趣味主義的毛病；即李、杜二人的異點，乾隆也沒有說出來。韓愈的意思，是李白有李白的好處，杜甫有杜甫的好處，用不着妄事批評，韓愈確有文藝眼光。還有趙次公的幾句話似乎爲妥當一點：「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體態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寫之於詩」。爲有點客觀的色彩。恭維杜甫的人雖犯了一些不經心的毛病，但總還有一點兩點批評得中肯處；如果以他

們的才力，用合理的科學方法，來批評杜甫乃至批評一切事物，則中國的批判精神早已樹立起來了。可惜，們既固於主觀，復不善用方法，以致留下些缺憾，但這缺憾不是不能補的；而且他們這些批評，那怕是不完全、不健全，對於後世去了解杜甫、認識杜甫，是有極大的幫助的。只有反對杜甫的人所說的百無一是處。

現在分開大點來批評杜甫的藝術，即杜詩：

第一點 杜甫是鑽到「現實」裏面去創造「理想」。這就是要研究：杜甫在文藝思想上究竟是一個什麼立場？試選兩種比較可以代表一般意見的說法：

胡適說：

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聲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這個時代的創始人 最偉大的代表是杜甫。……八世紀下半與九世紀上半的文學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光華燦爛的時期。故七世紀的文學還是兒童時期，王梵志、王績等人直是以詩為遊戲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應酬應制詩，更是下流的瓦礫兒，更不足道了。開元、天寶的文學只是少年時期，體裁大解放了，而內容頗淺薄，……天寶末年大亂以後，方才是成人的時期。從杜甫中年以後，到白居易死，其

閒詩與散文都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白話文學史）

傅東華說：

詩人不外以個人爲本位和以外物爲本位兩種：前者，批評家謂之主觀的詩人；後者，謂之客觀的詩人。客觀的外物是有限制的；所以客觀的詩人，無論氣性上、藝術上如何差異，他們的作品，總不外是外物的反映——逃不出現實的範圍的。主觀的詩人不然：因爲個人的想像境界是可以自由創造，受限制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往往隨作者個人的氣性，而表現各種超出現實的境界。……中古詩壇的兩個第一流作者——李白和杜甫——……前者成爲主觀詩人的代表，後來成爲客觀詩人的代表，分道揚鑣，各自佔有詩壇上永久的地位。（李白與杜甫）

胡適的批評，不過是指出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他能從歷代屢難不堪的關於杜甫的詩話乃至神話裏撥出一條清明的道路，這是他的過人的見解。傅東華知道運用科學方法來分析杜甫與李白，一洗前此籠罩、割裂等毛病，是自有他的卓見與手法。舊派研究杜甫的人且不管他，即以新派說，差不多的人都如胡、傅一樣，主張杜甫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家，但我對於這種說法仍不能認爲滿足。

本來，認識一個作家的立場是真正的困難。誠如謝一蒼所說：

杜甫不是一個什麼「抒情詩人」或「敘事詩人」或「浪漫詩人」或「寫實詩人」等簡單的
名詞所可包括。他的造就是多方面的；他的作品，大部份是寫實的，但浪漫的傾向也
非常濃厚；他以史詩爲人所稱道，但他的抒情詩亦爲後人所不及；他最能表現平民的
凄苦境況，他，常暴露貴族的極端生活；在同情窮者、同情勞動的地方，他，爲人道
主義者；在詛咒貴族、詛咒富人的處所，他是社會主義者；讀他的：「安得壯士挽
天河，淨洗甲兵不用！」我們知道他是個最徹底的非戰主義者；讀他的：「洗魚磨
刀魚眼紅，設網捉河萬魚鯨！」我們認識他是個最崇高的泛愛主義者。（杜甫生活）
我認爲這話是對的。說杜甫是一個完全現實主義者嗎？許多地方可以證明他並不是現實
的。一部杜詩裏，超現實，非現實，反現實，破現實的地方，多着呢！如他那些抒情的
詩，帶有浪漫色彩的詩，絕對不是一個嚴究了兒子的父親能夠做得出來的，這是非現實之
一證。說他是逐漸實踐主義的儒教徒嗎？而他的歌頌虛無縹緲的仙道詩及一些禪門偈語，
却是超現實的。當時「升官發財」的社會思想與士大夫心理是很流行的，他偏做不懼官而
且甯可餓死凍死，一一形之於詩，這不是反現實是什麼？對於政治的腐惡，軍閥的驕橫，
外交的失敗，民生的疾苦，道德的蕩然，他發出大無畏的怒吼，豈止不滿意現實，直欲衝
破現實，以展其革命主義的懷抱。這些地方，都是以證明杜甫並不是現實主義者而有充分
理想主義者的色彩。然則杜甫是一個完全理想主義者嗎？却又不然。一部杜詩裏，現實主

義的味兒，其義厚強烈。在他的作品上所表現的人生，主要的全是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恐懼與希望。他排斥一切抹煞現實只歸騁於美滿世界的浪漫思想，反對不顧人羣福利只謀個人解脫的出世生活。他明知現實是醜惡的，但他決不逃避現實，也不畏懼現實，反而越發去接觸現實、衝破現實。這是杜甫思想的特點。也是他的藝術生命的立場。

這樣講來，杜甫既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又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然則杜甫是一個什麼主義者呢？別忙，且進一步地分析研究！

其一，就文藝的本身說：文藝是人生的反映。所謂「反映」，一是反映自我，一是反映外物。文藝是具有這兩大功用：所有個人的思想、意志、情緒都可以藉文藝的力量來表現，所有事物的觀念、印象、尺度都可以藉文藝的力量來暴露。但無論自我或外物的反映，總脫不了人生，而人生的實習有理想的與現實的兩方面：現實的人生是指人類的生活動態，理想的人生是指人類的生命定型。前者多偏於物質方面，後者多偏於精神方面。一個人對於現象多是不滿的，換句話說：即生活的姿態常常在那裏變動，而變動的方向總是朝着生命那個定型去奔赴，以期充實並完成生命。所以文藝的根本意義，在如何利用人類的活動態以達到生命定型的目的。明白地說：即如何利用現實的人生以創造理想的人生。離開現實不會創生理想，離開現實的思想不是理想是幻想；同樣，沒有理想的現實不

是人生，是人生既有理想亦有現實；故二者是絕對不可分離的。我們不能從人生上或從文藝本身上區別他何者是現實主義，何者是理想主義。理想與現實是人生的兩面，也就是文藝的兩面。理想與現實不是對立的，是諧和的；不是分別的，是一體的。因此，杜甫的人生觀及其文藝上的成就，決不是一個片面的或不完全的名詞或術語所可包括的，決不是一個理想主義或現實主義所可了事的，而需要我們的綜合的觀察。像前人那樣支離破碎地分裂杜甫及其詩為若干段，若干系統固然是不對，像今人這樣硬把杜甫及其詩切作一塊兩塊也不對。我們所需要了解的，是杜甫及其詩的全部，是整個的杜甫及杜詩。

其二，就文藝的方法上說：也是以如何反映人生為標準。反映人生用一種什麼技術？用一種什麼技術才能把人生反映得有力？這是值得注意的！在文藝的方法上，有人主張可以分作主觀的描寫法和客觀的描寫法。所謂主觀的描寫法，是以作者自己的情緒為對象；客觀的描寫法，是以實在的外物為對象。由前之法，其作品使讀者只看見作者的情緒；由後之法，其作品使讀者注目在所描寫的實在——雖不是絕對看不出作者的情緒。但這種客觀的主觀的分類法，據我看來，不是描寫方法的本身，而是描寫方法的運用。我所說的描寫方法的本身是對一切以實在的外物為對象，而描寫此對象自然會生出一個結果：即由現實而奔向理想。然則所謂主觀的或客觀的描寫法，是指對於實在的外物的一種技術上的運用；明白地說：即對於此對象之實在的外物應該運用主觀的描寫的技術時則用主觀的描寫

法，應該選用客觀的描寫的技術時則用客觀的描寫法。進一步說：如果用主觀的方法反映得人生有力則用主觀的描寫法，如果用客觀的方法反映得人生有力則用客觀的描寫法。不能說是一個人一輩子無論對於什麼事物都是用主觀的描寫法或客觀的描寫法。因此，說杜甫所以反映人生的方法是偏於主觀或客觀一方面的，都未免有偏見。我們實在需要一個合理的觀察與綜合的判斷。像前人專用些抽象的字眼圖圖吞棗地雜談杜甫固然不對，像今人硬說杜甫是一個主觀或客觀的詩人與一個用主觀描寫法或客觀描寫法的詩人也不對。我們所需要了解的是杜甫所以反映人生的藝術方法的全部，即整個杜詩的技巧。

所以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是文藝上的對立名辭，是一線的總延長；主觀的描寫法與客觀的描寫法不是文藝上的分立陣線，是一物的兩作用。明乎此，可以講到杜甫及其詩了。杜甫就是站在綜合主義的立場運用巧妙的文學技術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當然不是拘守現實不顧理想，他也不是拋棄現實專重理想，他是鑽到現實裏面去創造理想。在所謂文藝作空中，也許有站在現實外去製造理想的，我敢斷定，像這樣製造出來的理想一定不能反映人生，反映出來的人生也不是真實的人生。同樣，也許有站在現實內專吃現實飯的作家，我敢斷定，那怕他的技術如何巧妙，其作品只不過是一尊雕刻極其精工的泥神木偶。惟有一面鑽到現實裏面，一面從這裏而創造出理想的作家，他的作品才真能反映人生、促進人生。杜甫的詩差不多無論那一篇那一首都能夠這樣。他對於現實不滿意，咀咒，但決

不止於不滿意，咀咒。他對於現實認識得愈深切，愈不滿意，愈咀咒，但他亦愈不放縱現實，從而糾正現實，要從現實中去創造理想。在杜詩裏，沒有一首沒有「物」，也沒有一首沒有「我」。在杜詩裏，沒有一首離開現實，也沒有一首離開理想。杜詩實在綜合地包括了這四個原素。試隨便抽出幾首詩來證明：（一）茅屋爲秋風所破歌。這首詩好像完全是寫實的，但他由現實創造出來一個理想，即因自己的「長夜沾溼何由徹？」的現實而生出「安得廣廈千萬間！」的理想，「雨腳如麻未斷絕」以前純用客觀的寫法，此後純用主觀的寫法。（二）哀江頭。這首詩開首就站在主觀的地位來客觀的描寫。通篇好像都是寫實的，但從實在的情景裏生出無窮感慨時事的憧憬，只「昭陽殿裏第一人」與「血污遊魂歸不得」，已抵得一篇長恨歌。（三）寫懷二首。這兩首詩好像是專寫他的理想，但也因爲「夜深坐南窗，明月照我膝」的實在情景而引出他的一片哲理；因係寫懷，故通篇差不多都用主觀的寫法。（四）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這一首詩，他熱情的奔放，宜乎純爲現實的與主觀的，但因聽了大捷報，喜極欲狂，自然而然地將主觀、客觀、理想、現實，揉雜在一起；如第一句是寫實的、客觀的，第二句是寫實的、主觀的，第三四句也是主觀的、寫實的，第五六句是主觀的、理想的，第七句是主觀的、寫實的，第八句便是客觀的、理想的了。這一類的例證不勝枚舉。

杜甫今論（四）

第二點，杜甫是抓住人生幾個重要支點開展反攻。研究杜甫的藝術，一定要看他的藝術上的支點；藝術既是代表人生，這話即無異說：一定要看他的人生觀上的支點。杜甫在純文藝的立場，雖說是綜合主義的，但人生是如何複雜的東西，人生像一面五光十色的鏡子，映在這五光十色鏡子裏面的物象更是如何複雜？杜甫不能把天下的任何事物都來反映在這鏡子裏。故杜甫思想或杜甫藝術一定有他的人生問題上的支點。杜甫抓住了這支點，了解文藝的本質，運用靈妙的技術，把他的心力集中在這支點上而發為詩歌，此其所以偉大而長垂不朽！

這支點是什麼呢？我以為有主要的四個：

一是反破滅的求生存。人類沒有不求生存的，貪生厭死是人之常情。杜甫以一個「人」的立場，以博愛主義者的心襟，代人類要求生存權，代被剝削或喪失了生存權的人求生存。因求生存，故反破滅。杜甫認破滅不但是人類社會的罪惡，而且也違反天生萬物的原理。因天生萬物是在遂其生長，而不是促其夭亡。在杜甫那時代，除極少數的分子外，一切個人團體均受了時代動亂與政治不良的影響而不能生存，杜甫本人便是其中的一個。即

舉社會經濟一端而論，在杜甫那時代，中國封建的農村經濟，實已到了山窮水盡破碎不堪的狀態。農民受着末路的均田法所謂租、庸、調的稅制，已不勝其剝削，加以政治上的貴族因生產上的發展，兼併土地的趨勢日益猛烈；大批農民，被強迫地在大地主貴族之下行其農業生產，以致收數大為減少，更兼徵役頻繁，十室九空，農村經濟的破產，成為劇烈的流行症；杜甫一生，到處遇着饑荒，時常挨餓，極人世之慘悽，即由於此。那班豪紳貴族的高壓，還是不斷增加；小朝廷式的節度使，不特驅使貧民爲之生產，且把租稅的全部都嫁之於農民身上；這便是激動當代農民原始大騷動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廣大的羣衆不能得着生存權而爭生存的根本原因。杜甫是飢餓線上之一人，他眼見廣大的流離羣，長的飢餓線，這一個社會已不是「人類」的社會，簡直是餓鬼地獄！他開始廣汎地替人類也就是替自己爭每一個人應該有的生存權，猛烈地向那些吃人的魔鬼如貴族、大地主、軍閥、貪官、污吏等代表封建階級的不良分子反攻！不僅如此，他認爲大多數人羣生存權之剝削與喪失，實根源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之不良，故進一步地向各種不良的制度反攻！不僅如此，他認爲支持這些不良的各種制度不能完全歸咎於某一個人或某一部份人，而是由於有一種傳統的思想之力驅使這些人爲惡，故更進一步地向這傳統的思想反攻！反攻的總目的，在要求生存權。

杜甫雖廣汎地代大多數的人羣要求最低度的生存權，但對生存權有一種嚴肅的解

釋。他認為團體的生存重於個人的生存。人類不應單獨分別而支離破碎地以求生存，必須固結在一個團體之下以求共存。而這個團體必須代表人類結合單位的總意志，故至少的限度是一個國家，擴而大之則為世界全體。國家如果不能生存，要想個人的生存，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每一個人，或某一部份人，或某一階級，或某一黨派，要想離開國家的生存而自謀其生存，則必致生存權之被霸佔或被壟斷，反面就是被壓迫或被剝削，其結果必釀極大的騷動或叛亂。杜甫認為生存權的解釋，應以整個國家為基點，不應以各個人或某部份為對象。換句話說：生存權是統一的，不是割裂的。杜甫自己明白，而且要使他人也明白：一個人的飢寒流離是一個時代的縮影，要解決這嚴重的問題，不是東求一頓飯、西借一件衣、找幾個朋友幫助蓋棟茅蓬所能了事，而是要為國家求有出路後，個人的嚴重問題，社會的急切問題，才得因之而解決。如果純照個人的悲憤，比如杜甫那種慘狀，他不是一個萬念俱灰的自殺主義者，就是一個要把「虛空破碎、大地平沈」的虛無主義者，然而他雖受着現實的無窮壓迫，他總不放鬆現實，硬與現實奮鬥到底！他所引為極端悲痛極端煩悶的，不是他個人或者他的一家戰勝不了現實，而是國家沒有相當的出路以致大多數人要失其生存，連他和他的一家都在內。所以他認為政治上的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前提，國家的生存權是一切生存權的基點。

這些根本思想，在杜甫的詩裏隨處都可以發現。他基於他的博愛的心襟，而此博愛心

標確係出於生存被壓制的反撥，故對於任何生物的「生」，他是維護的。試舉一二小例：如戲呈吳郎一詩，是記述一個偷棗子的婦人，杜甫體諒這一個窮婦人，故意讓她不偷棗度日，裝做沒有看見，而且還担心吳郎無意的插籬使她不敢再來偷棗，致遭餓死之慘，故作詩止住吳郎。他看見魚被捕，便把魚類生命的最後掙扎時的心理表現出來：「小魚脫網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口，大魚傷損皆垂頭，個個泥沙有時立」，這首詩（觀打魚詩）裏的「設網提綱萬魚急！」，與閬鄉姜七府設罾長歌「洗魚磨刀魚眼紅！」，有人說，皆足抵一篇戒殺文。又如縛鷄行：「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就彷彿聽見那鷄在亂叫，圖生命之掙扎。「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遺意。蟲鷄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這就是他的嚴肅的人生態度。暇日小園散步，將種秋菜，督飭耕牛，他看見「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留血，尚驚鄉鄰動。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寫鶴生存的悲苦激盪。自人類以至禽獸蟲魚，杜甫都能深刻的觀察而體諒其求生存的心理。擴而言之，再看他對於當時的民生是如何關切！自京赴奉先縣啄懷五百字，其中一段寫他過驢山時所目擊的王室奢侈情形，已如上述。一方面，對於貧民生存權之被剝削，表示極度的悲憤：「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驅馭貢城闕」。一方面，對於國家的總生存表示熱烈的維護：「聖人僅備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乘此物？」，他有這種崇高偉大的理想，但他個人及其家族的生存是怎樣呢？

「老婆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歸？燕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這是何等悲慘！而他還慷慨地說：「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撥！」，是不以一身及一家的悲苦爲悲苦，但思失業者，但念守邊將士，但知國家生存！

二是反侵略的重奮鬥 杜甫認爲威脅人類生存的魔爪是侵略主義。所謂侵略主義，在杜甫的眼中可以分成兩類：一是反強權主義，一是反續武窮兵主義。他是主張人類要有一種奮鬥心情、奮鬥意志，用這種純潔的心情與堅強的意志來反抗強權、主持正義。而他的反強權主義，不僅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而且是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在他的一生，外患內亂交迫，尤其是遭受了異族的侵略。如綿延八九年的安史之亂，契丹、突厥、吐蕃、回紇等的入寇，佔據中國的土地，蹂躪中國的人民，凋敝中國的財賦，擾亂中國的社會，使中國人民無法生存。分開來說：在杜甫中年以前，開元二十二年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二十六年大破契丹、林胡，杜希望攻拔吐蕃新城，二十七年蓋嘉運大破突厥，天寶六年高仙芝討小勃律虜其王歸，七年哥舒翰防禦吐蕃，八年攻破吐蕃石堡城，這都是在杜甫四十歲以前的國威。一到杜甫四十歲即天寶十年，鮮于仲通被南詔打敗，安祿山被契丹打敗，十四年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五年僭號於東京，至德二、安慶緒殺祿山自立，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乾元二年史思明稱燕王於魏州，殺安慶緒，陷東京。上元元年李光弼破賊於懷州，河陽，二年敗於北部，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這年杜甫正五十歲。寶

應元年雍王見回紇可汗於河北，進克河陽，李懷仙斬義首來獻，河南、河北悉平。安史之亂才平，而廣德元年吐蕃盡取河、隴，寇奉天、武功，入長安，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二年嚴武大破吐蕃，拔當陽城，收鹽井城，而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再引吐蕃、回紇入寇。郭子儀說回紇，會回紇軍擊破吐蕃於靈台。這年離杜甫之死只五個年頭了。在杜甫四十歲以前，大唐的國力還可以抵抗異族的侵陵，四十歲以後，國力一年不如一年。他是主張抗戰的，對於侵略極主張抵抗。王安石還杜詩，以洗兵馬塵卷，這首詩就是反侵略的民族文學。開首說抗戰的功績而斷定侵略主義者即將崩潰：「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羣過，胡危命在破竹中！」而「三年笛裏關山月」，個戰士的勞苦；「萬國兵前草木風」，誌會師的喜慶。次述統帥得人以及期待民族復興恢宏周宣。漢武的文業。如送柏中丞詩，獎勵從軍志士：「子弟先卒伍，芝蘭鬬瑀瑤，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使他每聞戰場說，歛激奮氣奔！。送蔡希曾詩，也是鼓勵戰鬥：「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窟門死，壯士恥為儒」。寄董卿詩：「猛將宜嘗胆，龍泉必在腰，……雲台畫形像，皆為掃氛妖！」。即成為杜甫非戰問題的「三更」，「三別」，不但像一般人所說的非戰作品，而如新安吏及新婚別，都係鼓勵子弟入營之作，如：「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潼關更是指示一個「慎重」的戰略。垂老別是暗示在侵

略主義下沒有一片乾淨土，而且逃難不是一個辦法。秦州雜詩中，爲民族生存而鼓吹抗戰的詩句尤多，如：「哀鳴思戰鬥，迴立向蒼蒼」，「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而觀兵一首，尤充滿戰鬥意志：「暮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但所有的戰鬥心情、戰鬥意志，都係爲着抵抗侵略主義者，爲着保障中國國土與主權的完整，爲着收復失地，故「司徒下燕趙」，是爲着「收復舊山河！」（散愁）；而一聞收復失地的喜訊，便不禁喜得發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這一類的詩不勝枚舉。杜甫實是一個侵略主義的咀咒者！

反侵略主義是對外而言，反黷武窮兵主義是對內而言。杜甫一方反對外族侵略中國，一方也不贊同當時帝王用英雄主義的方式來窮兵黷武。換句話說：即是他反對不珍重民力，不愛惜民力，一味的好大喜功；此種結果，不外三途：一無所獲，得不償失，慘敗而歸。

唐自開元十五年王君龜破吐蕃於青海，玄宗益修邊功。天寶八年，哥舒翰雖攻破吐蕃石堡城，然得不償失。據舊唐書載：玄宗方有事石堡城，詔問王忠嗣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玄宗因不快。天寶六年，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分兵接應，忠嗣阻勉而從，廷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徵入覲官。八年，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又據通鑑載：

哥舒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誦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玄宗有事於西戎，垂三十年，用哥舒翰於隴右，才克石堡，而靡敝中國已太多了！所以杜甫送高適的詩：「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則以高適那時正充哥舒翰的祕書。杜甫反對黷武窮兵主義，是不諱言的。

天寶十年，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西洱河，士卒死者六萬。楊國忠掩其敗狀，反以提聞。玄宗命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當時人民因爲聽說雲南瘴癘，士卒未戰而死者十八九，都不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者震野，這就是杜甫不朽的傑作兵車行的時代背景。杜甫對於抵抗侵略主義是極力主張的，但反對自己也變爲一個侵略主義者——雖不是侵略主義者，至少是黷武窮兵主義者。在楊國忠當權炙手可熱的當時，杜甫大胆地替民生呼籲，反對黷武窮兵，足見他對於人生的重要支點是始終堅實的把握着，一點不肯放鬆！

又如昔遊詩：「昔時倉廩實，洞達寰宇開，猛士思滅虜，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是指皇帝好大喜功，諸臣僥倖求進，不爲計民生着想。遣懷詩：「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攻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是指拓境以後的民生凋敝。最可注意的是前後出塞詩。前出塞爲徵秦隴之兵赴交河而作，後出塞爲徵東

都之兵赴薊門而作。前則主上好武，窮兵開邊，故以從軍苦樂之辭言之；後則嶺山逆節既萌，幽燕騷動，而人主不悟，卒有陷歿之禍。前出塞九首，以「君已富，境，開邊一何多？」爲主眼，以「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傷？」爲骨幹，雖在反對窮兵黷武聲中仍不忘其民族本位主義，故以「中原有鬥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爲尾間。後出塞五首，一方指出邊將之逢君由於朝廷之好大，而以窮兵黷武爲戒：「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一方仍以民族主義爲依歸，寫兵士不甘附逆開小差：「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里但空村！」以見兵禍之慘。

無論對外的反侵略主義或對內的反黷武窮兵主義，其目標乃在替最大多數的人要求生存權。侵略主義者蹂躪中國的痛苦與因好高騖遠開疆拓境自己所造的痛苦，同爲最大多數的人所不能忍受。杜甫即站在這一個支點不斷爲猛烈的反攻；但他雖在同樣反攻之中却自有其輕重的區別，即窮兵黷武雖不利於人民，然因是國家的行動，還有些地方給以相當的瞭解，只有對於異族的侵陵是不可恕的，杜甫反侵略的精神全着重在這一點。

三是反動亂的尙安定。杜甫認爲破壞國家危害民族威脅人類生存的又一重要點，是地方割據主義。當時時兵悍將的藩鎮軍閥，割據地方，儼然各一小朝廷，橫征暴斂，殘酷毒戮，人民骨髓，被其吸盡，在軍閥之間，彼此鬥爭，混戰殘殺，隨成層出不窮迴環不已的

內亂。因此，杜甫站在（一）大一統主義，（二）反內亂主義的立場上開始反攻。反攻所求以達到的目標在社會的安定。杜甫認為當前社會的需要是「安居樂業」，但要「樂業」，必先「安居」。而社會所以不安定的原因，即由藩鎮割據，紊亂系統，破壞法令，目無中央；又由軍閥互相殘殺，頻年混戰，不知掉轉槍頭，對外禦侮；故大一統主義的提倡與反內亂主義的呼號，不失為對症下藥。

大一統主義也就是反分裂主義。一個國家的土地固不可分裂，一個國家的主權尤不可分裂。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所有國家一切行政機構都應該絕對服從中央的指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如果指不聽臂之命令，臂不聽身之命令，試問成何人體？杜甫對於這一點特別認識得清楚，他痛斥藩鎮的割據，極力主張中央集權。江紱生記

于右任先生指示杜詩之精義，嘗語以後人所以綴工部每飯不忘君國者，非每飯思君之謂，正因其有一貫尊君之理論與政策在也。理論為何？即近代所謂之中央集權是已！

又說：

工部於漁陽事變之前，諸藩割據，早抱隱憂，而尤致憾於祿山聲勢之日盛。故其後出塞詩，一則曰：「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郡」。再則曰：「將驕益愁思，身貴不

尾論」。

又說：

工部孤懷苦志，老而彌貞！入蜀後流離失所，爲一生最艱苦之際，猶感賦諸將五章，重揭此旨。觀其第四首：「滄海未全歸禹貢，荆門何處盡堯封？朝廷衰廢雖多損，天下軍需不自供。」兩聯，痛斥蜀中將帥及大臣之出將者，當安危重任，不思所以歸職貢，復封疆，良已憾對朝廷，何反害及農時，濫支國庫耶？秉筆直書，辭義嚴正，此老蓋真能篤抱中央集權之信念而始終不渝者！

（均見民族詩壇第六輯汪聚生吟選札記）

杜甫對於大一統主義的尊奉，有一首詩表示得最明白，卽他雖飄零在同谷縣，登那鳳凰臺，却感咏着「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爲此，過翠盜何淹留」。登鹿頭山，說：「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指出中央政府只一個。過黃河，說：「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對於中央集權制之未能實施，引爲深憾：「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閬州東樓筵）；草堂詩：「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而張建封詩：「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師，舊丘豈稅駕？大廈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是勉以擁護中央共赴國難之旨。唐藩鎮有事，俱用偏裨上表，假衆論以脅制朝廷。杜甫在舟中苦熱

遺詩裏憤慨地說：「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貳……王事不肯微，凶徒略無憚」。而主張「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他對於藩鎮不朝最是痛恨。漁陽一詩，說河北諸將之不入朝：「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計！」；陷在賊中時，寄他的妹妹，還說：「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一聽了諸藩入朝的消息，便賀道：「始是乾坤王室正！」，「知有從來天子尊！」。而「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觀安西兵追赴中待命），最能代表反對割據、擁護統一的精神。「不愁巴道路，恐溷漢旌旗！」（對雨），是藉雨來寫出反對地方色彩、擁護國家意識的心理。此類詩句甚多。

反內亂主義即是反對軍閥的混戰。軍閥為爭奪地盤保持勢力而混戰，既橫征暴斂加重人民的担負，復驅使大批人民作內亂的犧牲者。杜甫對這班軍閥實在不能寬恕而盡情指斥。去秋行：「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是寫段子璋反時的慘狀。而三絕句，寫軍閥混戰時的奸淫擄掠焚燒殺戮，有「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的悲慘故事。這班軍閥的驕橫態度殘酷心性是：「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劉桢桀，背後狄桀等。談笑行殺戮，流血沒長衢」（草堂）。寫南州兵馬使劉治發防禦使殷仲卿的亂事，騷一匹「空鞍貫雙箭」負傷而奔的白馬，搬出「可憐」的「馬上郎」是為內亂而犧牲了（白馬）。徐知道造反掠劍閣，弄得「黃草映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黃草），只此兩句已見一片亂離景象。有感五首，一方深斥軍閥的叛亂，一方指摘藩鎮制度的不良：「非

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等聖主，何以報皇天？」而「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即指摘藩鎮制。蓋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等處節度使以統之。安祿山反後，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陷，盡取河西、隴右之地，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袵。杜甫作此詩時，正值史朝義下諸降將，奄有幽、魏之地，威恣不貢，代宗懦弱，不能致討，故說：「幽、薊餘地豕，乾坤尙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至征夫一詩，寫軍閥混戰的影響：「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誰見哭，城市不聞歌」。諸將五首，多係責備諸將大臣之辭，最後一首指蜀中將帥的混亂，即崔旰殺郭英乂，柏茂琳、李昌夔、楊子琳等舉兵討旰，杜鴻漸受命鎮蜀，旰旰，數薦之於朝，以節制讓旰，茂琳等各爲本州刺史，朝廷居然聽從，這簡直是太沒有紀綱了。「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這還不夠哀嗎？

杜甫對於這班禍國殃民無惡不作的軍閥，不惜用最嚴厲、最沈痛的語句來痛斥！如：「萬姓瘡痍合，羣兇嗜欲肥！」（送盧侍御），「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長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久客），「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草堂），「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送秦觀上閬州），斥他們爲「羣兇」「盜賊」「狐狸」「豺虎」「賊臣」「蝥賊」等，可謂深惡痛恨極了！這是因爲他們的罪惡太大，把整個的社會弄得天翻地覆，把全國的人民弄得鬼哭神號。農村破產，經濟凋敝，賦稅苛重，徵役頻繁，以致貧富懸殊，

道路蕭條，飢餓凍餒，流離死亡，就是這班軍閥的罪狀。且看杜甫宣布他們的罪狀：

柴門漚肉臭，路有凍死骨！

（自京赴奉先縣）

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北 征）

秦地無人耕，兒童盡東征。

（羌 村）

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無家別）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大麥行）

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

（送韋諷上圓州）

前有猛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

（夢圓中）

豈聞一絹直萬錢？有錢種穀今流血！

（憶 昔）

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

（釋 悶）

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

（別唐諫）

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三絕句）

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

（課伐木）

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

（驅豎子摘蒼耳）

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

（這週）

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

（送陵州路使君）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

（東屯北驛）

兵戈猶擁蜀，賦斂強輸秦。

（上白帝城）

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白 帝）

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

（奉贈廣瑒）

四是反勢利的立氣節 杜甫人格的不朽及杜詩的長垂宇宙，砥礪氣節是一個主要的基礎。李白、杜甫雖並稱，但杜甫作品在人格主義上的價值實超李白之上。李白的志願，如他在上韓荊州書所說的，要「徧干諸侯」以求「脫穎而出」，希望遇着一個能夠賞識他的「君侯」，將他一把提拔起來，使他可以「揚眉吐氣」；所以遇着韓荊州也好，裴長史也好，李長史也好，都是這種心緒。杜甫所結交的大都是當時朝野知名之士與李白一樣，可是他是純粹的友誼的結交，絕不含干謁的意味。如他對李邕的態度：「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但有一片相契之情，而無絲毫勢利之念。再看他對汝陽王璣：「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蓋言汝陽愛士，固不下淮南，而已則不欲自居曳裾之客。他一生的知己有幾個人：嚴武、房琯、高適、李白。這幾個人，或是煊赫的達官，或是跑紅的文人，但他對於他們的結交完全是一種純摯的友誼，不僅是純摯的友誼，而且是基於道義的結合或基於政見的相同。即從對這幾個人的交誼裏可以看出杜甫偉大崇高的人格與其藝術生命之真價值。如他對於嚴

武，在詩中提及的幾三十篇。送還朝，則云：「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再，則云：「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這還是嚴武生前；至於哭歸櫬，則云：「一哀三嘆幕，遺後見君情」；入哀詩：「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嚴武確是杜甫第一知己，故杜甫懷念嚴武最切！但他對嚴武雖有知遇之感與僚屬的關係，然徧觀其交遊痕迹，完全是以純摯的友誼與深厚的世誼來護的，絕無故意阿諛之語。如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以事業相期許：「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嚴中丞枉駕見過，以古人相比擬：「扁舟不獨如張翰，皁帽還應似管甯」。奉送嚴公入朝，發出感歎：「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而勉以「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可見杜甫認嚴武爲一生知己，並不是因爲嚴武做了大官就去恭維，同時嚴武對杜甫也敬重備至，懷慕甚殷。如酬別杜二詩裏，那最後幾句是何等親切：「祇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恨巴山裏，清猿惱夢思」。巴嶺答杜二見憶詩裏，對杜甫更眷念不置：「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那新唐書所說嚴武要殺杜甫的話以及舊唐書所說杜甫的種種怪脾氣，全是胡說。嚴杜風義，彪炳千古！對於房琯，更不比常人。杜甫一生大節，在疏救房琯。房琯罷相，杜甫力爭，其所以力爭，與其說是基於他與房琯的布衣交，不如說是基於政見的相合。房琯相玄宗時，建議遣諸王爲都統節度，當日安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撫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肅宗不滿意房琯已伏如此時。杜甫的有感五首之

第四首，即表示他同情於房琯分鎮討賊的建議，追歎朝廷不用琯議，以致宗藩削弱，藩鎮不臣，失強幹弱枝之義。所以杜甫的冒死救房琯，並不僅因朋友的關係，實具有政策上的共鳴點。房琯雖貶，杜甫雖因此而得罪（不是張鎰救，幾不免一死！），但杜甫這種光明磊落愛護國家的精神是始終勝利的！至於房琯罷相，是因討賊失利；而討賊失利，是因肅宗聽信讒言，使邢延恩等監其軍，致有陳濤斜之敗。杜甫深知這隱情，有悲陳陶、悲青坂南詩紀實：「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是責邢延恩等促戰而致敗。關於房、杜二人的風義及房琯罷相這段公案的真相，最好一讀杜甫那首長詩：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與那篇祭文：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尤其在這篇文章裏，首述大唐開國以來的興盛氣象，但到了房琯爲相時已換了一個面目：「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隴蕭條，乘輿播越」。在這樣一個混亂局面而房琯克盡厥職。房琯既貶官，鬱鬱以死，杜甫追懷其疏救經過，雖生死殊塗，而精誠一致，但人亡政息，空留破碎江山！到今日，「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邑自守，鼙鼓相聞」，痛斥軍閥割據的局面，仍回到同情房琯建議那一個回憶。別房太尉墓詩：「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何等哀痛！居雲安時，聽說房琯靈輿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又歎道：「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可見他兩人道義之交是生死不渝的了。對於高適，不但因詩人的興趣相投，不但以道義的風骨相合，而且也因爲抱有同樣的政治見解，故兩人的交誼最濃。杜甫送高適

第一首詩，就是上面舉過的在高適正做哥舒翰的秘書時，希望高適「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最緊的是要高適質問哥舒翰為什麼窮兵黷武？後來有送蔡希曾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一首，總不以好大喜功爲然：「漢使黃河遠，涼州白麥枯」；而以「健兒甯鬥死，壯士恥爲儒」相勉。又有寄高三十五書記詩：「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因高適是年過五十才留意篇什，一舉成名。到至德二年，高適做了淮南節度使，李輔國進讒，授太子少詹事，杜甫有詩寄慰：「時來如宦達，歲晚莫情疏」！後來高適遷彭州刺史，杜甫流亡秦州患瘡疾，還寄詩言志：「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高適到成都，與杜甫常會見，迭有唱和，在草堂共同計劃一個救國的方案，卽西山三城置戍論。原因是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百姓勞弊，當時的「四川人」真苦得不堪！高適主張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杜甫在替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裏，也請罷東川兵馬，悉付西川，與高適意見相合。杜甫還有東西兩川說，早已把「四川」看做復興民族的樞紐了。只可惜高適的疏奏上去，竟未蒙採納，孤負了杜甫入奏行裏滿腔的熱望。其後杜甫流寓閬州，聽到高適從成都召回朝，有詩奉寄高常侍，以「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相助。那知在第二年高適便死了，聞高常侍亡：「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時杜甫止寓忠州，後轉徙湖南，旅懷落寞，更憶良友，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一詩並序裏，簡直是一片淚痕！「東西南北更誰論？白首

舟病尚存！」，雖是白首扁舟而壯志不減：「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此卽所以慰亡友，亦卽所以報國家。對於李白，更開友誼的新紀元，李、杜的友情最爲奇特：「以夢相通，與魂對話」。夢李白二首，前疑其「恐非平生魂」，後憐其「苦負平生志」。前云：「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後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是魂？是人？是真？是夢？純以人類的真性靈出之。而天末懷李白詩，也有「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之句。春日憶李白詩，服其才思無敵，爲之加以定評：「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寄李白二十韻，痛其抱屈莫伸，爲之敘一小傳，所謂「才高心不展，道屈志難伸……留梁宋未足，惹以謗何頻？」，與「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之旨正合。考李白長於杜甫十三歲，自天寶三年罷翰林偕遊梁、宋間，以後遂成長別。故贈李白詩只在東都二首，其他皆係懷想之作，根本沒有見面。自從李白因永王璘事流夜郎，最後乃有「不見李生久」一詩，望其頭白早歸，彼此遂不通消息。一般人都說李白才高而狂，昧於明哲保身之道，只有杜甫極力維護他，最能諒解他。李陽冰草堂序云：「白乞歸後，就從祖陽南採訪大使彥允，讀北海高天帥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觀」。杜詩：「李侯金闕彥，脫事幽討」，「不願論簪笏，悠悠蒼海情」，「未就丹砂愧葛洪」，「還丹日月遲」，「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若參照李白那篇代壽山答王少府移文書的情懷，也許李白真是求神仙做道人去了？——像上面所舉的幾人，雖不足以代表交遊的

全部，但即此已可證實杜甫的人格：反勢力，重道義，立氣節。從歷史上看來，隋、唐開中國統一的新局面，是中國民族高度發展的時期，文化廣被於世界；然婚姻奴婢等制度猶襲南北兩朝之遺俗，又因女主、權相、藩鎮、宦官的驕縱，士以依附爲榮，不羞自薦，故氣節遠不如漢。杜甫有生的一段時期，正是婦人、權相、藩鎮、宦官交相誤國的時期，而一般志在做官的知識分子，不惜自貶身價以從事干謁，連超脫世俗的李白也所難免；杜甫認定勢利的結合是無益於人，有害於國家，所以極力反對勢利，而主張道義的結合，砥礪氣節。即從這一個支點發揮而爲詩歌，以轉移風氣。

杜甫抓住了人生上的四大支點，開展對於當時政治制度、軍事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文化制度、倫理制度的反攻，以創造他的文藝上的不朽的生命。而他所有一切反攻的立場，只有一個，就是：「革命主義的人生觀」上的「國家至上主義」。無論對於那一方面，那一部門，他是永遠堅定地站在這一個立場。故了解杜甫的人生觀，一定要洗清誤解杜甫的渣滓，從他的偉大崇高的生命史上去認識杜甫的全部及整個的杜詩。

（完）

本書審查證圖字第一四四七號

	有	新	版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海 金 銀	印 香 資 區 立 出 版 社	杜 甫 今 論
	重慶 武庫街八十二號	重慶 中一路三八〇號	重慶 中一路三八〇號